

## 七、外汇危机和“锅底景气”

### 1. 外汇危机

鸠山首相因病下台，继任的石桥首相也病倒了。石桥内阁组阁后仅两个月就为岸信介内阁所代替。岸信介是声名狼藉的反动人物，战前与关东军勾结，操纵“傀儡”满洲国政府，侵略中国，又作为东条内阁的阁僚参与对美宣战的决策。战后他从巢鸭战犯监狱出来，摇身一变而为强调日美合作的人物，而且迅速取得机会，当上了新内阁的首相。这届内阁遵照日本垄断资本的意图，十分热心地追随美国，为垄断资本的内外膨胀、加强反动统治而积极活动。

但是，由石桥内阁向岸信介内阁过渡时，日本经济正面临着非常的事态。日本垄断资本围绕着苏伊士运河战争所做的景气之梦，随着战争迅速结束而很快破灭了。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封锁捞取一大笔财富的期望，也随着该运河提前五个月开放和日本贸易的损益相等而落空了。问题不仅如此。由于原来估计战争将会扩大，苏伊士运河将长期封闭，因而从海外大量购进物资，以致进口激增，到1957年时便出现了巨额入超，使外汇丧失殆尽。于是实行了外汇配额制度，加强外汇管理。这样一来，估计限制进口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如果不及早进口货物，将来可能失去进口的机会，于是进口反而更加迅速地增加。贸易收支每月都出现巨额赤字，1956年末，日本的外汇储备近十亿美元，五个月后便减少到近五亿美元，到5月末时仅有五亿一千万美元，其后又进一步减少到四亿美元。

这样猛烈的投机进口造成了巨额的外汇流失。最初，政府以抑制国内物价高涨需要增加进口为理由肯定增加进口是正确的，并在国会上提出了刺激景气的“积极预算”，没有将外汇滔滔流失的重大事态特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但是，该项预算在3月末才获得通过。在外汇储备从五亿美元进而减至四亿美元的形势下，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增加进口了。实际上，进口反而剧增，4月、5月都突破了四亿美元。日本经济在对外方面顿时处于行将破产的境地。于是垄断资本急剧扩大的方针和池田财政大臣的积极财政，都遭到了大失败。

## 2. 景气恶化和摆脱危机

由于估计错误而发生的这场深刻的外汇危机，政府原来是无所作为地置之不理，此刻才匆忙改变政策。5月上旬，当人们还在讴歌神武景气时，日本银行突然公布提高公定利率，开始紧缩金融。抑制进口的措施也采行了。到6月中旬，政府决定了制止国际收支恶化的综合对策。

为摆脱外汇危机，政府乘早先预定的岸信介首相访美的机会，向美国政府和在美国政府影响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提供外汇贷款。结果到6月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给予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并于7、8月交给日本。8月间，日本同美国政府的华盛顿进出口银行之间又达成了一亿一千五百万美元农产品进口贷款的协议。

由于巨额的进口仍在持续进行，这时日本的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尽管接受了外汇贷款，但到9月末，其外汇储备仍维持在四亿五千万美元的低水平上。如果没有外汇贷款的援救，日本经济将会出现不可想象的状况。所以岸信介在访问美国以后，对美国的追随和从属态度迅即更为坚定。

由于采取了紧缩金融、紧缩财政、抑制进口等政策，景气陷入了停滞状态。1957年初以来大量进口的原材料和产品，造成了极大的库存压力。为了拯救垄断资本，由银行提供了巨额的库存贷款，另一方面却大幅度地削减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尽管紧缩银根，垄断资本的设备投资并没有中断。正是因为这样，1957年垄断资本的整个设备投资比急剧增加的上一年（1956年）又增加了二成。与此相适应，金融机构对设备资金的贷款1957年度比上一年度增加约四成。就是说，在金融紧缩的情况下，银行对垄断资本的贷款反而大大增加了。

为了满足扩大包括库存贷款、救济贷款等在内的周转资金信贷和设备资金信贷的需要，日本商业银行大大增加了从中央银行的借贷。所以日本银行即中央银行的贷款在1956年4月末缩小到一百八十四亿日元以后，到年末便增加到一千四百亿日元，进入1957年后更以异乎寻常的势头进一步增加，到8月时终于超过了五千亿日元，此后一年间一直维持在五千亿日元的高水平上。在通货管理制度下，作为国家机构的日本银行如何以提供信用的办法来援助垄断资本和防止景气恶化，于此可见一斑。

在金融紧缩的情况下设备投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当时的通产大臣和《经济白皮书》试图以设备投资的大型化和长期化以及连续工程很多来说明这个问题。对于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认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支持下对产业垄断资本提供庞大的信用，象这样的“大型投资”或长期投资持续下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产业垄断资本急剧而大幅度的扩张，完全是依靠银行的巨额贷款来维持的。撤回这种贷款当然不用说，就是对正在进行的设备投资停止发放追加贷款，也将给这类企业带来致命的后果。至于与产业垄断资本关系较深的银行本身，所受的损失和打击可能更加严重。

所以银行特别是以信用为招牌的银行，特别害怕出现这种情况。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经济恶化时，银行也要对产业垄断资本提供包括设备资金和周转资金在内的大量信贷。

这样，从1956年度初开始紧缩而在1957年度转为大幅度增加的设备投资，到1958年度时便减少了一成。到1957年年中为止急剧扩大的原材料库存以及到1958年初为止还继续增加的制成品库存，从1958年春开始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工矿业生产指数从1957年3月达到高点之后缓慢地趋于下降，但是进入1958年情况又有了变化，从春季开始，生产指数缓慢而明显地趋于上升。一度显著增加的就业，在金融开始紧缩时趋于减少，但在1958年春又有所增加，以后继续维持这个水平。

进口贸易在采取紧缩金融和抑制进口措施前一直猛增。然而，由于政府的紧急措施以及国内进口物资库存严重过剩，在抽紧银根的同时，进口大幅度地减少，一直到年末，连续减少有半年之久。到1957年末贸易收支大致恢复平衡，1958年中进出口仍处于平衡状态。整个国际收支比贸易收支先行一步，从同年10月起转为盈余，外汇储备也从这时开始增加。这样，外汇危机便由于进口剧减、获得外汇借款以及特需等原因而勉强摆脱。持续维持高水平的日本银行的信贷额，随着库存的减少和国际收支的改善，也从1958年9月起趋于减少。

另一方面，批发物价在实行紧缩措施后也缓慢地下跌，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股票行情也下跌了，但跌势比较微弱，因而比其它指标回升得早，从1957年末起趋于上升。

除股票价格和外汇储备的变动外，进入1958年后的经济形势，如上所述，从下降趋势转为停滞状态，而且1957年度的设备投资又意外的多，根据这些情况，经济企划厅判断，从此以后，由设备过剩引起的景气停滞将比较长期地持续下去，《经济白皮书》也发

表了这种看法，称之为“锅底景气”。

然而，这种预测实际上并不准确。景气的停滞虽在1958年中还在继续，但并没有拖得很久，进入1959年后，工矿业生产首先明显地趋于增长。“减少库存”持续一段时间后，从1959年5月起便开始补充库存，就业也从这时起趋于增加。继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到同年4月已超过十亿美元。因此到1959年的4、5月，景气已摆脱停滞而转入上升。

对于此次景气从恶化到回升的经过，有种种说法。有人认为景气后退不是由于设备过剩而是由于单纯的库存调整，以设备过剩论为根据的长期停滞的预测不成立后，这种主张更为得势。诚然，应当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库存变动的影晌是大的，但设备投资的剧增及以后的增减，对景气也不可能没有某种程度的影响，无视这一点而单纯注意库存的变动是不妥当的。仅着眼于库存的变动，就不会从周期危机方面考虑问题，而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中间危机或部分危机，不认为这是周期危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少。这种观点的论据无非是：生产没有全面下降，物价下跌轻微，没有伴随金融危机，或者景气在较短期间便由下降转为回升，等等。

但是，否定周期危机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首先，前面已经谈到，设备过剩作为当时景气恶化的一个原因，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次，当时的外汇危机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如果不能从海外得到外汇贷款，势必要改变紧缩金融，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景气进一步恶化，从而引起连锁反应，促使汇率下降，并使通货膨胀随之爆发。对于这些，所以能够防患于未然，主要是仰仗战后新的国际经济机构和基于同美国的关系而得到的外汇贷款，多少缓和了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恶化的景气。同时，商业银行提供信用，与此相关的日本中央银行提供信用，以及作为这种信贷的基础的通货管理

制度,还有国家财政的运用,即实行“积极”预算和增加财政投资额度,通过产业特别会计<sup>①</sup>延期支付景气繁荣时期的剩余金额,这些防止景气更加恶化的措施,都发挥了值得重视的作用。

总而言之,这种危机虽然不是战前那种在金本位制下出现的最典型的危机形态,也不是部分危机,而是普遍的生产过剩引起的普遍的生产下降,其基础仍然是某种程度的设备过剩。而且外汇危机造成的悲惨结局和景气的极端恶化等,即使依靠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新机能而回避掉,也可以认为这仍然是危机,而且是最近新条件下的危机的一种类型。在最近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以伴随金融危机为必需条件的循环性、周期性危机,虽然不敢说绝对没有,但也是极少发生的。如果将来真的发生了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经济危机,那将是资本主义濒临崩溃的危机,是比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重大事态。1957年的这场危机主要是经济的内部因素引起的,因此将它作为战后的经济危机来考察,是最适当的事例。

### 3. 从对外经济关系的动向来看

如上所述,正当外汇危机期间,岸信介内阁依靠美国援助得到了外汇贷款,这使岸内阁进一步加强了从属美国倾向,增高了对美国要求的修订安全保障条约的热情。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把它作为日美经济关系而首先作为日本自身的对外经济扩张来考察。

在日本垄断资本进入正式发展时期的鸠山内阁时,即在“神武景气”时期,垄断资本的眼睛已经贪馋地朝向海外、特别是朝向东南亚和中南美,这在前面已经谈过。岸内阁成立后,这种倾向进一

---

<sup>①</sup> 产业投资特别会计,是日本为发展经济、促进产业开发,以财政资金向重要产业投资的一种特别会计。这项会计,是在美援物资回头资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译者

步加强；与此同时，日本垄断资本的海外扩张、在海外的活动，迅速进入实行的时期。

作为一般的倾向，这是垄断资本谋求取得真正的发展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确保海外的原料基地、产品以至资本的输出市场的明显表现。同时也反映出，在神武景气碰到挫折和外汇危机时，为了摆脱危机和谋求将来的发展，垄断资本深感有向海外扩张势力的必要。

作为推进经济外交的姿态，岸首相在1957年曾两次出访东南亚各国，显示了相当的热情。而且在这期间，正当外汇危机之际，他又访问了美国，向美国提出了有关东南亚开发的岸设想。这就是设立五亿美元的开发基金及组织管理这笔基金的国际机构。总之，要求美国拿出巨额资金，主要由日本用于开发东南亚资源，这是因为由美国直接进行这种开发容易引起旧殖民地各国的警惕，所以由日本出面干，完全出于自私的目的。这在东南亚各国也招来了坏名声，而美国本意也不想干，结果这笔基金并未成立。但是，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岸设想在表露日本垄断资本随心所欲的愿望和意图的同时，直截了当地展示了它的从属美国的倾向及作为从属者所扮演的角色。这一设想也许在暗中得到了垄断资本的中枢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等的赞同，因此也可以视为它反映了日本垄断资本或者现已逐渐抬起头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对美从属性。

下面，我们将举出这一时期垄断资本向海外扩张的几个明显的例子。

钢铁垄断资本八幡、富士、日本钢管三家公司，为确保原料铁矿资源，从1958年开始着手对印度铁矿的长期开发。这是三家公司1955年对菲律宾、1956年对马来亚和果阿铁矿进行开发的继续。1957年，以八幡、富士两家钢铁公司为中心的日本垄断资本预定投资一亿美元，与巴西政府合办巴西乌季米纳斯钢铁厂并开始

建设。引人注意的是，作为开发海外石油资源的资本输出，在1957年到1958年，为获得阿拉伯海上油田利权并进行开发工作，成立了阿拉伯石油公司，使垄断资本获得并开发海外油田的多年夙愿得到实现。接着在1959年同印尼谈判提供日元贷款，着手开发北苏门答腊油田。

除此之外，各种各样的海外投资在把主力放在东南亚、中南美的同时，也涉足中东和阿拉斯加等地。

根据贸易会公布的材料，截至1959年1月1日为止，日本民间的海外投资总额达一亿一千四百二十三万美元，技术援助达一百十八件。

在民间投资以外，为促进成套设备的出口，在1958年决定对印度发放日元贷款（三年间达一百八十亿日元），是引人注目的。并且，在1955年以后，对东南亚各国陆续执行了赔偿。前面已经谈到，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这种赔偿工作只是部分地实施，以后便停止了，东南亚各国对此极为不满。尽管如此，美国在旧金山媾和条约行将缔结时，还是对日本采取免除赔偿的方针。由于东南亚各国坚决反对，美国不得不承认它们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但不是以拆迁工厂设备和现金来赔偿，而仅限于劳务赔偿，各方就此达成妥协。这样，对东南亚各国的赔偿工作，主要采取以新制造的产品偿付的形式。这种赔偿的代价完全是由日本的财政来支付的。这种赔偿方式，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方面还具有补充的作用。此后，对外赔偿都是与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同时进行的。诸如1955年同缅甸、1956年同菲律宾、1958年同印尼签订的赔偿协定及其执行，都是这一时期对外经济关系和资本输出的重要动向。接着，于1959年同南越也签订了赔偿协定。对以上四者的赔偿合计达十亿多美元，赔偿期限最短是五年，最长达二十年。在实行上述赔偿的同时，还进行了经济合作，金额合计达八亿多美元。

与这些动向相反,好容易好转起来的日中关系,由于岸内阁的上台而被完全破坏。1958年5月在长崎发生的中国国旗事件,尽管有台湾等方面捣乱的因素,根本原因仍在于岸内阁追随美国、热衷于加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其对中国的关系,完全以此为基点来考虑。1958年达成协议的日中钢铁协定、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以及其他协定和商谈,都由于岸内阁的这种态度,致使中国方面不得不宣布取消和失效,贸易关系于1958年5月陷于全面中断状态。美国强加于中国的出口限制,实际上在此前一年通过英国等国家之手已经大大突破,而与中国邻近,在银根吃紧和国际收支恶化的情况下十分需要扩大贸易的日本,却不与欧洲各国一起同中国进行贸易,而竟然与美国一起断绝同中国的关系,这是不可想象的。

#### 4. 提高生产率运动

自神武景气出现前后到这一时期,劳资之间和工会内部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提高生产率运动。

这一运动在欧洲,早在1948年就开始了。当时是在美国的指导和援助下,与马歇尔计划一起进行的。它的现实课题,正如日本生产率总部在自己出版的图书中所说的那样,是“在政治上,适应美国对苏联的战略攻势,……在经济上,依靠美国援助迅速恢复西欧经济,这是肯定无疑的。”(山本孝:《提高生产率的诸理论问题》,第59—60页)关于它的目的,该书又写道:“提高生产率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取高额利润,而且不能否认,为维持资本主义的现实,也要求美国与西欧双方开展这一运动。”(第63页)可以说,这一记述反映了问题的实质。

美国政府从1953年开始将提高生产率运动引进到日本,希望将这一运动注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恢复的日本资本主义。不

久便进入准备阶段，以美国剩余农产品的回头日元和从日本政府预算中拨出的一亿二千万日元作为活动资金，这样，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政府和垄断资本共同出力，于1955年2月成立了日本生产率总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听任资本家来掌握，势必给工人造成巨大的负担。不叫劳动生产率，只叫生产率，到底指的是什么，不明确。然而正是这样含糊其词，才被资本家利用来为自己扩大利润，给工人增加负担。生产率提高之后，或者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应该提高工资，提高生产率的利益应该在资本家、工人和消费者三者之间分配。但结果恰恰相反。

提高生产率“运动”的本质，正如刚才所引用的记述那样。因为提高生产率本身存在着很大问题，工人不能立刻表示赞成是理所当然的。这一运动引进日本之后，也曾遭到强烈的反对，围绕这一运动，在工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纠纷和混乱。

日本工会总同盟明确了八项原则或条件后，于1955年9月最早参加了生产率本部。全日本工会会议因所属全日本纺织工会同盟内部存在若干反对意见，稍后才参加。但是，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以下简称“总评”）采取了强烈反对这一运动的立场，并倡议进行反对提高生产率的斗争。

由于日本工会是以企业为单位组成的，在联系企业之间的竞争提出进行这一运动的问题时，持反对立场能否贯彻始终，不是没有问题的，何况垄断资本、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使用了各种巧妙的手段来进行瓦解活动。因此，总评及其所属的工会，特别是一部分工会干部，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接受了提高生产率运动的影响。加以垄断资本正从此时开始积极谋求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生产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等，在这样的浪潮当中，提高生产率运动的影响自然要继续扩大。所以在这一时期，总评所属工会不得不把斗争的重

点放在反对提高生产率上，但是取得斗争的效果，需要花相当大的气力，这也是很清楚的。

但是，从提高生产率运动的本身来说，其主要工作是实现所谓经营合理化、现代化和有领导的劳务管理。它们大部分是引进美国式的方法来进行。当时属于垄断资本一级的大公司，被列为受现代化指导的对象。但是，由于垄断资本迅速壮大，不久它们都各自从外国直接引进新的方法。所以此后重点逐渐转移到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对垄断资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等企业的现代化指导上。最受重视的是对工人方面的工作。和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sup>①</sup>采取的与工会正面对立的形式不同，它深入到工人中间，把工人的想法引导到对资本有利的方向，以消除其斗争力量。这种工作主要是针对工会干部和专业人员以及车间主任等进行的。于是，在劳资关系现代化的题目下，按照美国形式采取劳资协调的方针，进一步引进了“劳资协议制”。并以与海外交流的名义，接受美国政府的资金及其他援助，每年派遣为数众多的资本家、工人、学者、专家主要到美国进行考察。最近也向欧洲派遣这种考察团。到1962年为止，由日本生产率总部向海外派遣的考察团大致达四百七十个、四千七百人以上。

提高生产率运动在六十年代初似乎已接近于终止它的作用的时期。这一运动可以说在日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但是并未达到当初指望的那种目标。特别是在从根本上改变广大工人的头脑方面未必取得成功。在日本经济划时代发展时期，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与此相比，工资的提高却很低。于是资本取得的份额增加，而工人所得的份额减少。（据劳动省公布，1955年

---

<sup>①</sup> 日本经营者联盟简称“日经联”，是各地方经营者团体和各行业经营者团体的联合组织，成立于1948年，现在参加的团体约一百个，主要活动是处理劳资问题，作为资方代表，与工会处于对峙地位。——译者

到1961年期间,整个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61%,而实际工资只增加了32%。又据日本中央银行分析,资本和工人所得的比例,1956年为五十五比四十五,1961年则变为六十一比三十九。)这与生产率总部最初提出的“提高生产率的各项成果在经营者、工人、消费者之间公正分配”的“原则”大相径庭。工人对此都有切身感受。正是因为这样,提高生产率运动没有真正得到工人阶级的广泛支持。